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

何朝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第八輯

中國語言學論文選

20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民間文學采風資料匯編

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

《論語》辨疑研究

百年“龍學”探究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

衣食行：《醒世姻緣傳》中的明代物質生活

清代杜詩學文獻考（增訂本）

上架建議：文學理論

ISBN 978-7-5325-9249-4



9 787532 592494 >

定價：68.00元

易文網：www.ewen.co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

何朝暉 著

貴州師範學院內部使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 / 何朝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8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ISBN 978-7-5325-9249-4

I. ①晚… II. ①何… III. ①出版事業—文化史—研究—中國—晚明 IV. ①G239.2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104274 號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

何朝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4.875 插頁 6 字數 374,000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978-7-5325-9249-4

K·2662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貴州師範學院內部使用

獻給先師王天有教授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出版說明

山東大學素以文史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裡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黃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榮、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著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著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絕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

輯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003年10月

【附記】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已陸續編輯出版多種，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2012年1月，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和《文史哲》編輯部的研究力量整合組建為新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許嘉璐先生任院長，龐樸先生任學術委員會主任（龐樸先生於2015年病故）。本院一如既往，以中國古典學術為主要研究範圍，其中尤以儒學研究為重點。鑒於新的格局，《專刊》名稱改為《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繼續編輯出版。歡迎海內外朋友提出寶貴意見。

2019年3月

目 錄

| | |
|---------------------------|-----|
| 緒 論 | 1 |
| 第一章 士人參與商業出版活動的歷史考察 | 31 |
| 第一節 宋代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 | 33 |
| 第二節 元代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 | 64 |
| 第二章 晚明士人從事商業出版活動的背景 | 71 |
| 第一節 晚明士人的經濟狀況與治生途徑 | 71 |
| 第二節 晚明商業出版的興起 | 90 |
| 第三節 晚明的學術、文人與商業 | 100 |
| 第三章 官員與商業出版 | 113 |
| 第一節 備考階段的舉業書編纂活動 | 113 |
| 第二節 在任官員的商業出版活動 | 120 |
| 第三節 致仕、罷職官員的商業出版活動 | 161 |
| 第四章 落第士人與商業出版 | 184 |
| 第一節 舉業書作者與時文選家 | 184 |
| 第二節 山人與出版 | 219 |
| 第三節 涉足商業出版的其他落第士人 | 251 |

| | |
|------------------------------|-----|
| 第五章 書坊經營者與職業作者、編校者 | 267 |
| 第一節 世家子弟經營書坊 | 268 |
| 第二節 普通士人經營書坊 | 285 |
| 第三節 書坊主的商業性圖書編創 | 298 |
| 第四節 由商人儒的書坊主 | 314 |
| 第五節 受雇於書坊的作者與編校者 | 329 |
| | |
| 第六章 作序、掛名與托名 | 352 |
| 第一節 撰作書序 | 352 |
| 第二節 列名鑒定、參訂、校閱 | 358 |
| 第三節 被人托名 | 378 |
| | |
| 第七章 晚明士人商業出版活動的意義 | 398 |
| 第一節 士人的廣泛參與推動了商業出版的繁榮 | 398 |
| 第二節 商業出版之於士人的經濟意義與社會意義 | 406 |
| | |
| 結 語 | 425 |
| | |
| 參考文獻 | 431 |
| 後 記 | 465 |

緒 論

一、本書的旨趣

在中國出版史上，晚明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關節點。晚明出版業以商業出版的蓬勃發展和巨大繁榮為重要特徵，它給中國古代出版業帶來了量和質兩方面的飛躍。在經歷了明初以來的長期低迷後，書籍出版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出版物數量急劇增加，明代後期的出版量是明代前期的數倍之多，出版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商業出版在整個出版業中的比例大幅增長。萬曆以後，坊刻書在數量上超過了家刻書和官刻書，進而占到出版物總量的一半以上。儘管印刷術早在七世紀以前已經發明，但印本直至十六世紀中期才在書籍流通規模上超越手抄本，晚明商業出版的崛起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晚明商業出版的繁榮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其中主要因素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推廣和識字階層的擴大、城市文化和消費社會的發展。而士人群體，在晚明商業出版的發展繁榮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人口增長、教育普及，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參與到科場的激烈競爭中，但科舉解額的增加遠遠趕不上士子數量的增長，於是無法通過科舉入仕、游離於社會上的士人日漸增多。作為一種謀生手段，這些士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商業性圖書的撰著、編輯、出版、推廣等活動中，為晚明商業出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和人力支援。晚明士商觀念發生重要變化，士商融合趨勢加強，不少在職或罷閒、致仕官員也以各種方式涉足於商業出版活動。

晚明士人從事商業出版活動的形式多種多樣，參與出版的圖書範圍十分廣泛。這一群體人數衆多，影響深遠，在晚明商業出版研究和士人研究中理應獲得應有的重視。本書致力於揭示晚明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狀況，彰顯士人在晚明商業出版發展和繁榮中的作用與地位；同時通過考察這一士人群體的行為方式和生存狀態，以及參與商業出版活動對士人身份的影響和重新塑造，揭示晚明士人的一種重要職業選擇，為晚明士人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維度。希望本書的研究能夠拓展和深化對晚明士人群體和晚明出版業的認識，對於晚明社會史、出版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已有研究回顧

與本書有關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分為晚明士人研究與晚明出版業研究兩個方面。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唐代後期已經產生了民間印刷出版業，最初的出版物以佛經和曆書、蒙學讀物、醫書、陰陽算命等坊刻讀物居多。因而士人與商業出版之間的關係，最早應可追溯到唐代。對唐宋以來士人的研究，近年成果頗多。黃雲鶴的《唐宋下層士人研究》，闢有“唐宋下層士人的經濟來源”、“唐宋下層士人的文化貢獻”兩章，提到唐宋時期下層士人有賣文、傭書為生的，但沒有涉及下層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在分析唐宋下層士人的著述動機時，列出了以著述為事業、隱逸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入仕手段、獲得社會聲望、作為社會交往手段等，也未提到通過著述謀利。^① 葉燁《北宋文人的經濟生活》，在“北宋文人入仕前的收入來源”一節，提到傭書與經商兩個來源，但未論及商業出版；在“北宋文官在貶謫、守制與退職期間的經濟狀況”一章中

^① 黃雲鶴：《唐宋下層士人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144頁。

談到官員以潤筆補貼用度，在“仕途以外文人的經濟生活”一節談到教學、耕作、賣詩文、經商等幾種自給求食方式，但其中並未包括從事商業出版活動。^① 臺灣學者梁庚堯《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收有《南宋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一文，列舉了田業基礎、商業經營、俸祿與束脩、其他來源等收入來源，在商業經營部分提到臨安陳起、陳續芸父子的陳宅書籍鋪和唐仲友在婺州開的書坊，在其他來源中提到代作、潤筆和編寫話本、劇本的書會才人，但均一筆帶過而未展開，亦未將士人的商業出版活動作為一個單獨的方面看待。^② 么書儀的《元代文人心態》，在“失去了莊嚴感之後——飄浮在社會下層的吏和書會才人們”一節，對入元以後失去仕途前景的士大夫與勾欄瓦肆結合而成的書會才人的心態有細緻的描繪，但沒有對雜劇劇本在演出之外是否用於出版進行探討。^③

相較于唐宋元三代，關於明代士人的研究成果要多得多。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對明代士人心態的研究，如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等等；^④二、對士人交往、結社的研究，如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文人結社

① 葉燁：《北宋文人的經濟生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6—27、131—140、149—163頁。

② 梁庚堯：《南宋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19—321頁。

③ 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158—171頁。

④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商務印書館，2014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東方出版社，1997年。

與明代文學的演進》，李玉栓《明代文人結社考》等等；^①三、對士人生存狀態的研究，如劉曉東《明代士人生存狀態研究》、劉曉東《明代的塾師與基層社會》、周榆華《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等等；^②四、對明代生員和山人的研究，著作有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代表性論文有金文京《晚明山人的活動及其來源》、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方志遠《“山人”與晚明政局》、馮保善《山人小史——兼論明清山人知識群體的生成》等等；^③五、對明清易代之際士人心態與活動的研究，如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等等。^④ 以上幾個方面的成果對本書皆有啟發，但與本書的主題直接相關的主要是關於生員、山人等下層士人的研究和關於

①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徐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中華書局，2006年；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玉栓《明代文人結社考》，中華書局，2013年。

② 劉曉東：《明代士人生存狀態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劉曉東：《明代的塾師與基層社會》，商務印書館，2010年；周榆華：《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③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文京《晚明山人之活動及其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1期；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史學集刊》，2000年第2期；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方志遠：《“山人”與晚明政局》，《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馮保善：《山人小史——兼論明清山人知識群體的生成》，《尋根》，2005年第4期。

④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士人生存狀態的研究。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第六章“生員的社會職業流動”中列舉了訓蒙、遊幕、業醫、經商、訟師及棄巾成爲山人等選擇，其中沒有提到從事出版活動。該書第九章還論述了生員的經濟地位和貧困化。^① 陳寶良的另一部著作《明代社會生活史》第一章“上層社會及其生活”中談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士紳階層出現分化和生員的貧困化，在第二章“社會下層衆生相”中談到了士人的棄儒就賈之風。^② 張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學研究》第二章“山人的生存方式與文化品格”第二節“山人的賣文筆耕與文化經營活動”，其中的“文化經營活動”指的就是出版活動。此節以張鳳翼、梅鼎祚、陳繼儒、童珮^③等人爲例，說明一部分山人依靠出版謀生。^④ 劉曉東的《明代士人生存狀態研究》是第一部分系統研究明代士人治生途徑及生活狀況的專著，在士人的經濟來源中，列舉了教學、遊幕、賣文、耕作、醫卜雜藝、從事工商業等各種選擇，沒有把從事商業出版作爲一種治生方式加以論述，僅在賣文部分簡短地提及士人選編時文的活動，在論述明代士人的經濟人格時談到陸雲龍、馮夢龍、凌濛初在晚明文學藝術商品化的趨勢下從事通俗文學創作。周榆華《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專注于晚明文人靠詩文（不涉及小說戲曲）寫作技藝謀生的情況，作者主要關注文人“作文受謝”、換取潤筆的事例，在“其他謀生方式”一節，論及文人編纂、梓行、售賣書稿的活動，以張鳳翼編刻圖書的活動作爲例子，並提及陳繼儒和馮夢龍。但這部分篇幅不足一頁，難稱詳盡。可見在歷史學界，對從事商業出版活動的士人群體普遍

①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第296—357、413—423頁。

②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56—66、110—118頁。

③ 童珮賣書自資，不附權門，是否應歸入山人，容有疑義。

④ 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132頁。

缺乏足夠的重視。在關於士人職業選擇與生存狀態的研究中，僅有零星的關注，沒有把從事商業出版活動作為士人的一項重要職業選擇來看待，對這一士人群體的規模、影響認識不足。

在出版史研究方面，各種通論性的印刷史、出版史著作，如張秀民、韓琦《中國印刷史》，肖東發等主編的9卷本《中國出版通史》，吳永貴主編的《中國出版史》，肖東發著《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中國編輯出版史》等等；各種斷代出版史，如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肖占鵬《唐代編輯出版史》，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走向大眾：宋代的出版轉型》，楊玲《宋代出版文化》，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元代出版史》，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等等，均在論述各個時代的出版業狀況時介紹了主要的出版人物。^①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是一部體例特別的著作，它在很多方面的論述系統性不強，但卻以跳躍的、隨感式的筆調提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給讀者帶來啓發。他在第八、九、十四章都談到涉及商業出版活動的士人，但受限於著作體例，對士人商業出版活動的揭示難稱系統完整。^②

對於士人與商業出版關係揭示更深入的是各種專題研究著作。魏希德在《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衝》中，討論了舉業書的出版對南宋科舉考試標準的影響，其中涉及呂祖謙、陳傅良、

① 張秀民、韓琦：《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肖東發等主編：《中國出版通史》，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吳永貴主編《中國出版史》，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肖東發：《中國編輯出版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肖占鵬：《唐代編輯出版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楊玲：《宋代出版文化》，文物出版社，2012年；田建平：《宋代出版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井上進著，李俄憲譯：《中國出版文化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朱熹等士人的圖書編刻活動。^① 甲斐雄一《南宋的文人與出版文化：圍繞王十朋與陸遊的研究》第三章圍繞《王狀元集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分析了王十朋與建陽書坊之間的關係。^② 朱迎平的《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第八章通過幾個個案論述宋代文人對出版的參與，其中涉及商業出版的是朱熹。^③ 宮紀子《蒙古時代的出版文化》重在探討元代官方和上層士大夫與書籍出版之間的關係，較少涉及商業出版。^④ 就本書關注的明代來說，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第四章“明末江南的出版人”，以陳繼儒和馮夢龍為個案解剖了“因出版業興隆而產生的新型知識分子”的活動。該書第三章“明末江南出版文化諸相”第一節“李卓吾思想的流行”談到晚明被坊賈冒名甚多的李贄及托名者葉晝，第五章“《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動”第一節“士人與出版”分析了小說中描寫的時文選家。^⑤ 賈晉珠 (Lucille Chia) 在《為利而印：11 至 17 世紀的福建建陽坊賈》中，對明代建陽的書坊主以及為書坊主編校圖書的下層文人進行了深入研究。^⑥ 周啓榮 (Kai-wing Chow) 《早期近代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力》一書在“商業化寫作、考試和出版”一章中，討論了晚明士人介入商業出版的各種活動。有應書賈之請作序或掛名

① 魏希德著，胡永光譯：《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衝》，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

② 甲斐雄一：『南宋の文人と出版文化：王十朋と陸遊をめぐる』，九州大學出版會，2016 年。

③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24—266 頁。

④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年。

⑤ 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⑥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of Jianyang, Fujian (11th - 17th Centuries)* (《為利而印：11 至 17 世紀的福建建陽坊賈》)，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以推銷圖書的，也有圖書的作者和出版者。他區分了“士商”出版者和作者的各種類型，如以陳仁錫為代表的士人文化出版者，以馮夢龍為代表的娛樂文化出版者，以許自昌為代表的出版資助者，以孫鑛、鍾惺為代表的點評者，以及徐奮鵬、李贄、焦竑、袁宏道等當時受讀者追捧的作家。周啓榮運用“場域”、“象徵性資本”、“副文本”（paratext）等理論工具來分析晚明的商業出版活動，對士人參與商業出版的方式作出了許多精闢的分析，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諸多啓發。^① 周紹明的《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在第三章“書籍發行與士人文化”的“士人”一節中，討論了中國古代士人在書籍生產和傳播中扮演的角色。他提到的涉及商業出版活動的士人有張鳳翼、艾南英、毛晉、陳繼儒、顧元慶、殷仲春、童珮等。周紹明的著作在分析文人藏書活動與書籍流通的關係方面獨闢蹊徑，但他對士人參與商業出版的討論並不深入。^②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在第二部分“‘書客’群落：職業出版傳播者的成長”集中討論了作者、出版者、寫工、畫工、刻工、印工等出版從業者。^③ 他認為職業化的出版傳播隊伍在宋代初步出現，明代發展壯大。他將晚明的作者分為官紳作者群、山人墨客作者群和書坊作者群；以鄧志謨、吳還初、郭偉為例討論了為書坊工作的下層文人編輯；^④把書坊主分為文人書坊主、以徽商為代表的商人出身的書坊主、刻工出身的書坊主，文人書坊主又分為科場失意者、有一定功名者、有仕宦身份者。他分別以余象斗為出版家兼作家、

①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早期近代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力》),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③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

④ 本書認為，編輯職司文字處理、校對等工作，而非包括編纂圖書在內的創作活動，故以鄧、吳、郭三人為書籍作者，而不是編輯，詳後。